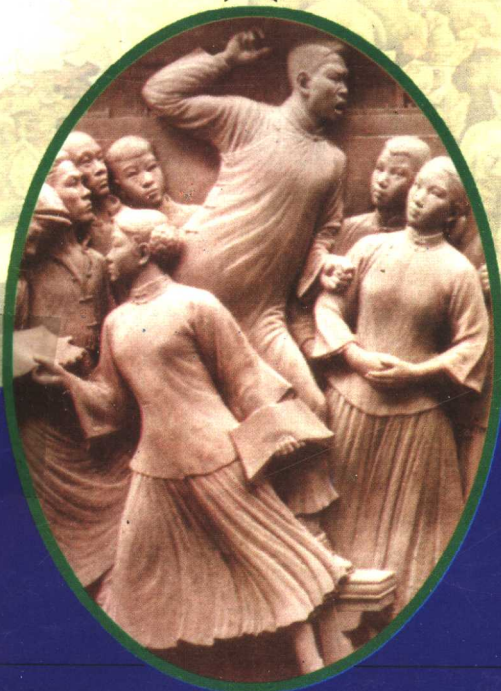


中华魂百篇故事

记一·二八淞沪抗战 记抗日英雄赵一曼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魂百篇故事

(第七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为了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朱耀章：《月夜巡视阵线有感》

1931年9月18日深夜，驻在中国东北沈阳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向中国军队公开发动了武装进攻。从此，日本开始了其罪恶的侵华战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加上这时国民党政府正专意进行内战，围剿红军，对外敌的入侵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而日军在三个月时间便占领了我东三省。骄横的日军得陇望蜀，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我国华北和华东地区，并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然而，正当日本侵略者陶醉于自己的春秋大梦时，1932年1

月，上海黄浦江畔的枪声却将他们的迷梦震得粉碎。这便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他们纷纷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一方面想继续霸占我国东北地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世界舆论和人类公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金蝉蜕壳”和“偷梁换柱”的诡计——抬出早已被中国人民赶下了台的清朝皇帝溥仪，来建立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作为他们的傀儡政权，以便他们在幕后操纵，从而使日本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日本又想出一个一箭三雕的阴谋——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因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把国际视线由

东北问题转移到上海问题上、借机混淆视听，声东击西；二则可以对南京构成直接威胁，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军事压力，逼迫蒋介石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日运动；第三，日军可乘机在上海取得军事上的根据地，以巩固它在东三省的既得胜利，并为将来进一步进攻中国内地提供一块跳板。

为此，臭名昭著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便给其爪牙——当时任日本驻中国使馆派驻上海的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大尉发了一封电报，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日本人想使满洲脱离中国而独立，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因而叫他策划一个阴谋，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从而达到这一目的。接着，又给田中送了二万日元来，作为其活动经费。当时，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其实是中国人，是清朝贵族肃亲王的女儿，原名叫金碧辉，后为日本在东北的特务头子川岛浪速收为养女），正

在上海活动，田中隆吉因早与她有所勾搭，就将2万日元交给了她。当时，上海有一个叫做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因为一向反日情绪强烈，早为日本人所嫉恨，因而田中隆吉要川岛芳子在这个公司上多做些文章，以便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即既挑起事端，又将这个公司牵扯进来，从而拔掉这颗眼中钉。

1932年1月18日下午，五个身着西裤，脚穿皮鞋，披着袈裟的“日本和尚”，经过引翔港行至马玉山路三友实业公司门口，贼头贼脑地窥探。这时，川岛芳子预先找好的几个中国流氓，冒充三友公司的工人，上前盘问。片刻，他们便打了起来。“日本和尚”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这就是所谓“日本和尚”事件。

日本侵略者借此“兴师问罪”。1月20日凌晨2时，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由日本浪人组成的“上海青年同志会”会员32人，携带武器、木棍、酒精和煤油等物品，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和四辆装甲

车的掩护下，蜂拥至引翔港，放火焚烧三友实业公司，并打伤正在值勤的中国巡警两人，另一位巡警急步冲向电话亭，想叫消防队来救火，结果被他们当场打死。当天下午1时，日本侨民一千多人乘机举行暴力示威，电请日本政府派海陆军压制中国人民的排日运动，狂呼“杀尽中国人！”的口号。几十名暴徒还沿街挑衅，手持木棍将中国十多家商店橱窗打碎，还用棍棒乱打过路行人，中国同胞数人被打伤。

1月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登载了日人放火焚烧三友实业公司的新闻。《民国日报》的标题中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字样。22日下午，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借口事实不符，向该报提出无理要求：主笔向陆战队书面谢罪，在报纸上以半版的版面刊登谢罪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罢免直接责任记者职务，并限23日上午5时前答复。《民国日报》在上海是有很大大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揭

露日本的侵略，宣传鼓动上海人民团结御侮，发动上海人民抗日救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日军对它早就怀恨在心，因而这一次便乘机发难，借题发挥。该报对日军的无理要求未作理睬，只表示对新闻报道予以“更正”。但是在当天下午3时，日侨1000余人又集会，围攻报社，《民国日报》被迫接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劝告而停刊。

日人在上海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进行向上海武装进攻的准备，除“九·一八”事变以来陆续驶抵上海的大批军舰外，日本海军在21日又派出了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这些舰只于23日晚抵达上海。24日，日海军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

日本浪人暴动闹事发生后，上海新任市长吴铁城于24日下午派人前往日本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表示遗憾，并答应严纠凶犯。25日上午，村井到市政府对吴市长当面又表示了前述态度，但又

反过来对日本僧人被打受伤一事提出书面抗议，并进一步提出了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严缉“凶徒”；三、赔偿医疗费和抚恤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和各种抗日团体，封闭《民国日报》。并威胁说，如不给予满意答复，则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27日，村井又向吴铁城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48小时以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本人将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断然态度实现此要求。当天下午，日本海军省又发表声明：“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的妥当的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据最近情报，以正式军队对日本作敌对准备。日本海军望中国停止此种行为。万一国民政府不肯反省，不停止不法行为，日本于自卫上不得不采适当之行动，以保护日侨及维护既得权，以期万无遗憾。”

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面前，上海市长吴铁城，不仅不组织民众与侵略者进行斗

争，反而被其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他秉承蒋介石屈膝投降的政策，接受了村井的最后通牒，下令取消抗日团体。还在发表的谈话中污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未遵法定程序，举动又时越常规”。28日下午4时45分，吴铁城答复日本总领事，表示完全接受四项要求，企图以打击爱国力量的手段来讨日本的欢心，谋求对日妥协。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日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挑衅闹事只不过是他们玩的花招，借此寻衅发动侵略战争方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因此28日下午8时30分，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目前上海不论租界内外，人心动摇，不稳的局势日益恶化。工部局公布了戒严令。各国军队正在严加警戒。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的敌对设施。”这一声明发表后3小时，不等中国方面作出答复，日军即

开始了所谓的“自由行动”，出动陆战队冲向我闸北阵地，发动了对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进攻。至此，由田中隆吉一手策划的整个阴谋便算完成了。这时，他的主子和上司——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立即给他发来嘉奖电：“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大日本帝国皇军向你表示祝贺和慰勉。”

“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

当日军进攻时，驻上海的中国军队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任军长。

1930年冬，十九路军奉命进入江西，在蒋介石的威逼下参加围剿红军，结果屡遭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抗战呼声，响遍全国。驻扎在江西的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3万余人，毅然在

赣州召开誓师大会，表示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1931年冬，十九路军调防卫戍南京、上海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当时，十九路军有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的营房，彼此可以望见，我军官兵故意每天在日军面前举行野外演习，让日军知道，屈服退让的是国民党政府，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1932年初，十九路军从日本人不断挑衅闹事和日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的活动，断定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在战争爆发前的短短十多天内，积极厉兵秣马、屯粮备弹，作了必要的应战准备。

1月23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兴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都

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个死的方法。……现在请戴司令再来指示我们。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共死！”接着戴戟讲话，他同蔡廷锴一样，表示“死守国土”，“做民族自由之神”。他说：“自从东三省问题发生以后，兄弟就觉得做中国人实在该死，尤其做军人，更其受刺激得难过。兄弟个人觉得受良心上的责罚，真是痛苦。”他接着谈了最近几天来日本人挑衅的情况，最后豪迈宣誓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才是真正办法。”“我们死守国土，我们做民族自由之神！”与会人员都很激昂，表示要坚决抵抗。蔡廷锴立即宣布：如日军正式进攻，我军即就地坚决抵抗，把侵略军压迫到黄浦江畔，加

以歼灭。

就在这时，正在病中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作了即席讲话，他说：“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候，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还不如他们。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在所不惜。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

根据会议决定，在当日下午7时向各部发出密令，命令各部“严加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达解释了23日所发的密令，并进一步作了战备动员。

两次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

成了战略战术上的准备，全军动员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人。

之后，蒋、蔡、戴三人联名发表了《告淞沪民众书》，其内容除叙述“九·一八”以来日本的侵略行为和近日上海日人挑衅，并派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外，表示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份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

当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主要是海军陆战队，共约3000人。中国军队共有33000多人，但在淞沪地区布防的仅有1个团加1个营，实际上还没有正面的日军多。更主要的是，我军的装备远不足日军精良。日军除了有很多装甲车、坦克、大炮外，还有飞机60

架、军舰几十艘。

这样，一方要发动进攻，另一方要坚持抵抗，战争已如在弦之箭，根本无法避免了。

“一·二八”深夜的枪声

1932年1月28日深夜，喧哗了一天的上海已渐渐静下来了，四周夜幕沉沉，只有为数不多的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亮着。夜，静悄悄的，只有黄浦江的江水拍击岸边的哗哗声不时传来。在这黑暗和寂静的夜空里，空气中却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息，一双双眼睛都在暗夜中静静地注视着对方的动静。23时30分，一阵极清脆的步枪声突然破空响起，打破了那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接着，机关枪的声音如爆豆似的响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分5路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在闸北布防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从此开始了。

战斗打响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同时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29日凌晨1时，他们三人又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声明：“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表明了战斗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

由于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在战前便夸下海口，狂妄宣称“四个小时占领上海”，因而日军从进攻一开始便气势汹汹地扑来。中国军队也早已义愤填膺，早就想狠狠教训这些侵略者，于是也英勇顽强地奋起还击。这样，